

计划经济时期的名酒规划、实践及其影响^{*}

郭子健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的白酒企业纷纷以“名酒”为营销口号参与市场竞争,但名酒的培育、规划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3年,政府为稳定市场,继承和保存名牌产品,确立了“八大名酒”。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酒类生产被纳入轻工业轨道,名酒对于政府充实财政、参与国际市场乃至展示国家形象的意义逐步凸显。20世纪60年代,轻工业部门建立全国公开评酒制度,各地方酒厂纷纷以名酒为样板,积极参与名酒评选和竞争,以期获得更多投资。轻工业部也先后组织“茅台试点”和“易地茅台试验”,以行政手段推广名酒酿造技术,力图实现名酒的增产。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全国各地酒厂在20世纪70年代集中创牌,部分酒厂依靠模仿名酒工艺成功跻身全国评酒会。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名酒规划,也成为改革开放后酒厂改制、创牌,甚至从事市场营销的制度源流。

关键词:名酒 计划经济 工业

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廊坊市酿酒厂曾印制广告宣传其新产品——迎春酒,并撰写了如下广告词:

廊坊市酿酒厂所产迎春牌迎春酒1976年在华北酒业会议上被评为第一名;1979年被评为廊坊地区的名酒和优质酒,作为河北省的种子酒,参加了全国第三届评酒会,荣获全国优质酒称号……本品是在茅台酒工艺的基础上,采用选育优良菌种,以麸曲代大曲,用红粮加适量麦麸的先进工艺精工细作、酿造而成的质优价廉的酱香型白酒……号称“北方小茅台”,是佐餐和馈赠亲友之佳品。^①

迎春酒在1974年才创牌,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新酒”。^②在广告词中,酒厂尤其强调迎春酒与茅台酒工艺的相似性和历年来所获名酒的称号,可见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白酒企业重要的营销资源。那么,广告词中提及的各种评酒活动从何而来,又因何举办?茅台酒的工艺又是如何被地方酒厂获取、借用的?各酒厂围绕名酒的市场行为是否存在制度源流?若要回应上述问题,就须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名酒规划的成因、经过及其影响。

目前,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名酒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论性的描述和梳理,或从文化遗产学、经济人类学角度予以分析,较少讨论名酒规划政策的运行实态。^③至于对当代白酒工业的研究,则多从行业、

[作者简介] 郭子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300350,邮箱:guozijian@nankai.edu.cn。

* 本文为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中国前期酒类消费政策研究(1949—1978)”(批准号:63232134)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迎春牌迎春酒(麸曲酱香)》,20世纪80年代迎春酒广告单行页,郭子健收藏。

② 刘军:《北方小茅台》,《中国食品》1990年第3期。

③ 参见曾纵野:《中国名酒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0年版;黄萍:《贵州茅台酒业研究(1728—1956)》,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0年;王临川、陶文俊:《酒负盛名:茅台酒的经济人类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技术本身出发,鲜有关注意到白酒工业成长过程背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①而名酒作为一种消费品,其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角色是否符合学界通常认知的“崇俭的消费伦理”?^②本文根据地方档案和若干企业内部资料,希望考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扶持和培育名酒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并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对中国酒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一、国家名酒的认定和管理

“名酒”,顾名思义,是指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酒类产品。中国酒类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十分悠久,酒的酿造与销售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其往往以“土产”或“特产”的面貌出现,因此酿酒产地就成为传统意义上名酒的符号。例如茅台酒就因其产于盐运贸易中心的茅台镇而得名,近代以来茅台酒依靠政商网络和市场变迁走向品牌化,茅台酒生产商纷纷以“茅”或“茅台”为标识,并以酒坊商号为名注册商标。^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产地仍是市场认可名酒的主要依据。1951年,中国土产公司编辑出版了各地土产情况介绍,其有关茅台酒的概述最先强调了“产于本省遵义专区属之仁怀县茅台村”,同时声明“虽有华、赖、王、金、丁等数种之别,但前三种制酒厂,系设于该村内,历史悠久,后二种系就近在贵阳,仿照茅酒制法,历史较短”。^④

1949年后,新组建的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肩负起酒类产销的工作,酒类评比活动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52年秋季,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举行全国专卖会议。会后,来自各地的酒类专卖干部,携带家乡的酒类样品,参加了一次内部评酒会(后被称为“第一届全国评酒会”)。本次评酒会从参选的103个酒样中评选出8种全国名酒,分别是茅台酒、汾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玫瑰香红葡萄酒、味美思、金奖白兰地、绍兴加饭酒。白酒虽仅有19种样品参选,却获得4席名酒称号,占比高达一半,这可能与民间广泛的白酒消费需求密切相关。此次评酒结果在1953年由官方公布,从此“八大名酒”的名号在全国流传开来,上述4种白酒品牌又被称为“四大名酒”。^⑤此时,“名酒”已经成为官方认证的一种称谓。入选的全国名酒迅速获得了一项酒类专卖管理体制下的“特权”——被允许跨区域销售。在销售中,名酒会被粘贴名酒流通凭证,不受限制地行销全国。^⑥

据参加评酒的辛海庭回忆,此次评酒“尚无复杂的产品标准”,主要根据历史传统和市场信誉来排定名次。^⑦主持评酒会的酿酒工程师周恒刚也提到,名酒的入选条件包括:品质优良;受到全国大部分消费者喜爱;历史悠久且在新政府实行专卖之前就曾行销全国市场;制造方法具有地方特色不能伪造。^⑧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举行评酒会并授予“名酒”称号?这就要从1949年后的财经政策和酒类专卖制度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军费开支、脱产干部人员的供给支出、基础建设投资等经费不断上升,保证国家工商税收和实施酒类专卖制度就成为缓解财政压

① 有关当代中国白酒工业史的研究,参见秦含章:《现代酿酒工业综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7年版;熊子书:《中国名优白酒酿造与研究》,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洪光住编著:《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林超超:《新消费伦理的建构及其制度逻辑(1949—1956)——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21年第6期。

③ 郭子健:《近代中国“茅台酒”品牌的演进》,《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中国土产公司计划处编印:《中国土产综览(初稿)》,1951年印行,第749页。

⑤ 周恒刚:《中国历届评酒回顾兼谈其作用》,马连镇主编:《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第1卷,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3页。

⑥ 在酒类专卖实行之初,各专卖公司为节约运输成本,一般执行“地产地销”原则(即在当地生产也在当地销售);同时由于酒类专卖是分阶段进行,各地亦划分为“专卖区”和“非专卖区”,酒类运销不得跨区。参见《中国专卖事业公司第二届全国专卖会议总结》(195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编印:《有关副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辑(烟酒类)1951.1—1957.4》,1957年印行,第20页。

⑦ 本刊编辑部:《辛海庭谈新中国酒政始末》(上),《中国酒》2007年第7期。

⑧ 周恒刚:《中国历届评酒回顾兼谈其作用》,马连镇主编:《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第1卷,第933页。

力的措施,名酒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要保证国家工商税的征收,大中城市的市场稳定和消费品的充裕十分重要,而民众对名牌的认可和需求会影响到市场的这些情况。1952年6月,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就曾提出,对名牌货要提倡“不要名牌货不好”。^①另一方面,在酒类专卖政策推行之初,^②负责设计酒类专卖制度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曾乐观地估计,当年全国可销酒6亿—7亿斤,实行专卖后,不仅可获得税收近万亿元(旧币),专卖利润还有近6000亿元(旧币)。^③而要实现上述销量,就要从市场角度考虑酒的质量与品牌,使酒类产品中的“名牌货”扮演稳定市场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参评的“家乡酒类样品”并非是由产地的酒坊随意选送,而是出自专卖部门领导下的国营酒厂。以茅台酒为例,在本次评酒会召开之前,仁怀县政府先后以赎买、没收的方式,在成义、荣和两酒坊的基础上组建了国营茅台酒厂,酒厂划归贵州省专卖公司管理,开始生产“贵州茅台酒”。此时,同样产自茅台镇的“赖茅”(由恒兴酒厂生产)仍在市场上销售,但获得名酒称号的只有国营的“贵州茅台酒”。可见,民国时期的市场基础和国营酒厂的身份是构成本次“名酒”认证的两大必要条件。

但是,名酒的质量虽好,却消耗粮食较多,在当时也进行了改进,但质量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如茅台酒的酿造工艺复杂,投粮次数多,出酒率低。^④随着茅台酒生产管理体制的转型,节约粮食还是保持品质成为国营茅台酒厂面临的矛盾。1953年2月,国营茅台酒厂宣布接收恒兴酒厂,将其设备、人员造册移交,并入茅台酒厂。^⑤此时,全国公私厂矿企业基本完成民主改革,进入生产改革阶段。贵州省也开始把生产改革作为企业的中心任务,要求企业“改善生产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与计划生产”。^⑥8月,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共中央要求各企业提出增产计划,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节约原料,以增加国家收入。^⑦尽管中共中央在文件中强调要兼顾产量和质量,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很难做到。贵州省在9月部署增产节约工作时,要求同时推动企业的生产改革,通过增产节约和生产改革不仅要完成计划,还要进一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⑧而到了遵义地委,增产节约的重点就化约为三个指标:税收增加、紧缩节约、上缴利润。^⑨地方工业部门对不同门类企业的改进方向也有不同侧重,酿酒业因出酒率低、粮食消耗多,成为浪费严重的典型。^⑩

尽管在1953年10月,轻工业部针对国营轻工业面临的问题即强调,产品质量不好是目前最

① 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1952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② 1951年1月,财政部召开全国专卖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酒类专卖,并明确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各级机构为酒类专卖的经营管理者,生产计划由总公司统一制定,流通销售亦须获得总公司许可。参见《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1951年5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编印:《有关副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辑(烟酒类)1951.1—1957.4》,第7—8页。

③ 《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提出的酒专卖方针》(1951年5月23日),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的酒类专卖》编写组编著:《中国的酒类专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④ 茅台酒的生产须经过七个轮次,第一、二轮次酒质不稳定,只能继续加入高粱继续酿造,方得出高品质的酒。加入高粱的过程被称为“下沙”,因此酿造茅台酒的工艺也被称为“回沙”。

⑤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编:《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⑥ 《贵州省一年来工作概况与今后任务》(1953年1月2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2009年印行,第10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1953年8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

⑧ 《苏振华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3年9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第153页。

⑨ 《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第一次)》(1953年10月7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20-1-79。

⑩ 《贵州省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省专县地方工业会议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54年2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第280页。

突出的问题,反而是一些私营工厂“注意了质量,名牌货畅销”,从而占据了市场。^①但茅台酒厂受到遵义地委部署增产节约方向的影响,只能将提升产量、降低成本放在首位。1954年1月,茅台酒厂借劳动竞赛开启了“生产改革补课运动”,对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出更高要求,并着力提高出酒率。^②酒厂认为茅台酒原本的工艺成本较高,积压资金,因此提出缩短生产周期提前产酒。“改进”的方法是,加速发酵,缩短出酒时间,不等到中间轮次就取酒。此后,酒厂更提出“一年四季都产酒”的口号。这种技术“改进”颠覆了茅台酒的核心生产工艺,遭到老酒师郑义兴的反对。很快,郑就被批判为“思想较古,有守旧意识”。为节省成本,酒厂甚至试验过用二锅头的方法生产茅台酒。^③郑义兴遭批判后,只能配合增产节约的精神提出提前产酒的方法,用熟高粱代替生高粱,在第一次投粮时就出酒,取代以往投粮三次才能产酒的工序。1955年上半年,这一工艺在全厂进行了推广。^④按照增产节约的要求,茅台酒储存时间的长周期与工业部门极力避免积压资金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唯有缩短储存周期,尽快出厂,但所谓“多产多销”并不符合消费市场对名酒品质的要求。

1955年11月,第一届全国酿酒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央政府部门组织的首次全国性的酿酒业会议,此时各地酒厂已基本由国家专卖部门领导,其产销被纳入国家工业、商业计划。在会议期间,工业部还组织了一次内部的评酒会,最终茅台酒的成绩很不理想,甚至排在了高粱糠酒、地瓜干酒后面。参加此次会议の時任茅台酒厂厂长张兴忠感到“在名酒的威望上和政治上都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除茅台酒外,1952年获评“八大名酒”称号的其他名酒质量也有所下降。对此,地方工业部部长沙千里在会上提出,茅台酒等四种名白酒,经研究暂不改变操作,如需改变必须经过试验、细微研究,且保证质量,报上级机关批准再进行生产。^⑤

对名酒质量的批评包含两个重要背景。从内销层面来看,重视轻工业消费品的质量与国家在统购统销及对私改造出问题后集中组织恢复传统商业、工艺、产品的命令有关。1956年初,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特别指出轻工业产品的劣质:有些饮酒色泽混浊、味道寡淡,“是醋不酸,是酒不辣”,酒的含铅量严重超标,甚至一些地方名酒都存在有苍蝇、蛆虫,被消费者讽刺为“苍蝇大曲”。^⑥此时,国务院已认识到造成其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统购包销“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生产单位不对消费者直接负责,对自身产品质量和市场消费者反映无感。^⑦从外贸层面来看,轻工业消费品已经开始承担出口创汇的功能,其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信誉和竞争力。1955年9月,陈云在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时提出“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出口工业品的创汇利润远高于出口原料,同时强调“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不仅从经济上来说应当如此,从政治上来说也应当如此”。^⑧事实上,陈云所言更牵涉到名牌产品的政治意义。工业品作为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自然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和利润率,但政府同时也将品牌声誉视为衡量国家能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指标。茅台酒厂在总结中提到:恢复工艺就是避免让民众认为“社会主义建成了,名酒质量下降了”。尤其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茅台酒质量下降更会引发国外消费者对工业化的质疑,从而造

① 《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党组对目前国营轻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1953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第113—114页。

② 《茅台酒厂生产改革十八天进行情况临时书面总结报告》(1954年1月30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55-4-125。

③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编:《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第98页。

④ 《茅台酒厂五四年上半年工作总结》(1954年7月9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42-6-26。

⑤ 《茅台酒厂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传达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报告》(1955年12月17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82-2-8。

⑥ 《商业部关于提高食用酒质量问题的报告》(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编:《有关副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辑(烟酒类)1951.1—1957.4》,第193页。

⑦ 《轻工业产品质量的情况和问题——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的发言》,《光明日报》1956年6月21日,第5版。

⑧ 《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1955年9月23日),《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59—661页。

成政治影响。^①

1956年初,国务院计划拨款2340.8万元给八大名酒厂,要求各酒厂延长酒的窖藏时间,规定名酒的储存周期除绍兴加饭酒为5年外,其他均为3年。^② 资金下达后,其主要用于提高酿酒质量,建设储酒仓库,如汾酒厂利用拨款扩建了酿酒车间,还建造了储酒能力达1500吨的酒库,用于储藏老酒。^③ 茅台酒厂也调整了产销比重,库存酒在原有150吨的基础上增加到400吨,陈放后再行出厂销售。在国务院提倡恢复传统工艺、发展名酒的指示下,自1956至1957年,各名酒厂不再单纯追求数量指标。

名酒厂获得了中央层级投资和重视,使地方更倾向于发展名酒,以期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各地陆续出现“搞名酒热”。^④ 如1956年6月,四川宜宾专卖公司决定利用留存的老窖,恢复五粮液酒的生产,并向宜宾专署和四川省专卖公司申请资金。在国务院恢复名酒的背景下,宜宾专署同意扩大五粮液生产,要求五粮液“适当增加窖藏时间,以提高品质适应出口需要”。^⑤ 茅台酒所在的遵义地区则在“二五”计划制定时规划另一款名酒董酒的投产,且茅台酒和董酒在5年内产量都要提高100倍以上。^⑥ 当然,如何确保各地培育的酒类产品成为新的名酒,则需要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

二、争创名酒与全国评酒机制的地方实践

尽管1952年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通过举办评酒会确定了“八大名酒”,但酿酒行业内普遍认为,1952年的评酒会只是专卖部门内部组织的,1963年才是全国首次公开层层选拔、评尝的评酒会,各项制度也更加完善。^⑦ 1963年1月,轻工业部准备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国评酒会,并向各省市发出通知,要求其在6月份先对省内优质酒进行评比,然后再报送轻工业部参评。与此同时,轻工业部还对参评及评比标准做出明确规定:(1)参评产品必须“年产量50吨以上”,且“在广大群众中有信誉”。^⑧ (2)在评酒中要注意“白酒名单中必有一种普通酒(即“大路货酒”),如无选送普通酒,亦不得以其他酒顶替,普通酒系指当地产销量较大的白酒,如小曲酒、薯干酒、麸曲酒、高粱糠酒等”。^⑨ 本届评酒会特意为普通白酒进入优质酒名单提供制度保障,其目的就在于鼓励非粮酒和低成本白酒的生产,并以“名酒”称号引导民众消费习惯,从而配合节粮酿酒的政策。

全国评酒会确立了两个等级,分别是“全国名酒”和“全国优质酒”。各地报送自己评比出的“地方名酒”,送到北京后成为“全国优质酒”的候选名单。评选出全国优质酒后,将再从中选出全国名酒。^⑩ 评选全国优质酒和全国名酒的工作则由专门的“全国评酒委员会”负责。如表1所示,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由各地推选,一部分由轻工业部直接聘请的商业系统人员组成。在各地推选委员时,负责参加白酒品评的委员往往由传统白酒产区所在的省份产生,其他酒类(如黄酒、果酒)亦如是,如白酒组的全国评酒委员就包括山西、贵州、陕西、四川、安徽、吉林、辽宁、黑龙江、江苏、广西、山东、河北、北京等13个省市推荐的委员。评酒委员会也成为全国酒厂技术交流的平台。

① 《国务院(四、五办)关于同意地方工业部所提改进八大名酒和啤酒质量的意见的指示》(195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编:《有关副食品商业政策文件选辑(烟酒类)1951.1—1957.4》,第186—187页。

② 《国务院拨款帮助八大名酒厂提高酒的质量》,《光明日报》1956年6月20日,第1版。

③ 《汾酒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汾酒通志》,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4页。

④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轻工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⑤ 《四川省宜宾专员公署工商科关于同意扩大五粮液生产并从本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本市原有大曲老窖的批复》(1956年6月23日),宜宾市档案馆藏,档号022-003-0279。

⑥ 《遵义地区专署关于第二个五年轻工业规划意见(草案)》(1958年8月),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46-6-7。

⑦ 熊子书:《缅怀周恒刚先生》,《中国酒》2007年第6期。

⑧ 《轻工业部为在第三季度评比全国优质酒请做准备的函》(1963年1月12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⑨ 《轻工业部办公厅关于评比全国优质酒工作几项说明的函》(1963年7月2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⑩ 《轻工业部为第三季度评比全国优质酒请做准备工作的通知》(1963年4月3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表 1 1963年全国评酒委员会白酒组委员名单

姓名	年龄	岗位	所属部门
胡子良	45	科长	河北省轻工业厅
牛业武	—	科员	商业部烟酒公司
龚文昌	51	工程师	北京市酿酒厂
申德禄	58	技师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
李宗民	27	技术员	辽宁凌川酒厂
孙继科	42	工程师	吉林酒厂
高月明	30	科员	黑龙江省轻工业厅
崔高明	—	副厂长	江苏洋河酒厂
房艺武	40	科长	安徽濉溪酒厂
马凤鸣	33	厂长	山东景芝酒厂
曹述舜	35	技术员	贵州省轻工业厅
郝仲文	48	厂长	陕西西凤酒厂
唐昌缙	—	副厂长	广西桂林饮料厂
吕振修	—	副科长	四川省烟酒公司
陈茂椿	—	工程师	四川省轻工业厅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国评酒办法》(1963年11月),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以贵州省为例,省轻工业厅接到通知后,随即开展省内公开评酒和选拔工作,并决定在1963年6月召开全省评酒会,且将评酒结果报送至北京。^①此前,茅台酒是贵州省内唯一的全国名酒。八大名酒会议后,贵州省也加快了创牌的步伐,许多新名酒得以创制成功并投产,并通过常态化的地方评酒机制脱颖而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董酒和方酒。

董酒民国时期即有出产,原产于遵义北郊董公寺,创始人为程明坤,最初被称为“程家窖酒”,后改名为“董公寺窖酒”,故被称为“董酒”。1949年,程明坤因财产遭劫、卷入诉讼等变故破产,董酒也随之停产。^②1956年,遵义地区财税部门提出恢复生产董酒,并邀请原作坊主程明坤担任酒师。次年初,贵州省轻工业厅对试制董酒做出批复,由遵义地区财政局拨款2000元,利用原有程家作坊的窖池和技工就地生产,当年即试制成功。1958年1月,酒厂将“新董酒”的样品报送贵州省轻工业厅,再转送至轻工业部。董酒试制成功的消息最终传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并收到国务院办公厅“建议当地政府恢复、发展”的回函。酒厂决定正式建立董酒车间。^③一时间,董酒成为贵州省内争创名酒的典型。在“大跃进”背景下,董酒厂房“边建边生产”,4月份动工,仅两个月就全部投产。^④不过,董酒的“跃进”愿望并未实现。1959—1961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地方名酒生产所用的粮食捉襟见肘。如表2,1960年10月,遵义地区取得140万斤酿酒用粮指标,且几乎全部用来供应茅台酒厂,董酒因此被迫停产。直至1961年10月,董酒才再次恢复生产。当年11、12月,遵义地区粮食局又每月拨付董酒专用粮10万斤用于酿酒。^⑤

① 《贵州省轻工业厅关于召开评酒会议的报告》(1963年5月1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② 刘孚忠:《董酒大事察闻》,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遵义文史资料》第4辑,1984年印行,第22—24页。

③ 陈守刚:《国密董酒,酒中奇葩》,李明先主编:《瑰宝流韵:红花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2015年印行,第29—30页。

④ 《遵义造酒厂1958年生产工作总结报告》(1958年12月30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46-6-5。

⑤ 《遵义专区粮食局关于61年10—12月份董酒指标》(1962年1月5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4-82。

表 2 1960 年 10 月、1961 年 10 月遵义地区酿酒用粮分配数量表 单位: 万斤

	1960 年 10 月	1961 年 10 月
茅台酒	134	40
董酒	0	3
鸭溪窖酒	0	1
制曲用粮	6	2
遵义地区合计	140	45
全省合计	200	80

资料来源:《贵州省轻工业厅、商业厅关于下达十月份酿酒制曲酵母用粮指示有关问题的通知》(1960 年 10 月 11 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 61-12-55;《贵州省商业厅、轻工厅关于 10 月份酿酒制曲用粮指标和调酒的分配通知》(1961 年 10 月 10 日),贵阳市档案馆藏,档号 160-6-180。

至于方酒,则产自毕节地区大方县。大方县酿酒业基础薄弱,20 世纪 50 年代尚无独立的酒厂,仅在大方县联合厂下设酒类生产部门。^① 1960 年,大方县联合厂派副厂长张必明到临县的金沙酒厂学习酿酒技术。仅一年多后,方酒试制成功并投产。^②

方酒在省内,同样得益于常态化的评酒机制。1961 年 12 月 21 日,贵州省轻工业厅组织了一场全省内部评酒会议(茅台酒不参评),董酒与方酒两款新酒分列第一名和第三名。^③ 仅仅试制成功几个月的方酒,名次反超其“师傅”金沙酒。从各种汇报材料可以看出,毕节地区工业局(以下简称“毕节工业局”)作为方酒所属大方县联合厂的主管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动方酒成为名酒。1961 年 12 月 25 日,毕节工业局也举办了全区饮料酒质量品尝评比会议,方酒位列首位。毕节工业局即刻将上述产品报省轻工业厅备案,希望方酒能复制董酒的成功。^④ 1962 年 6 月,贵州省轻工业厅筹备全省评酒委员会,除轻工业厅、商业厅派人担任委员外,还要求各地区报送酒厂代表。评酒委员对全省名酒的评定具有决定作用,能够派人担任评委也是酒厂地位的象征。毕节地区原本报送了毕节酒厂和大方县联合厂两厂代表作为评酒委员,后因省评酒委员会缩减人数,毕节酒厂的代表未能入选,大方县联合厂代表就成为毕节地区唯一的评酒委员。^⑤

1962 年 11 月,贵州省轻工业厅再次举办评酒会议,并在会上指出,对质量差、耗粮多的酒将安排其减产或停产。这意味着在保证少数名酒质量和节粮酿酒的双重要求下,质量不佳的粮食白酒将被淘汰,评酒会的名次也将决定酒厂今后获得资源的多寡。^⑥ 此次评酒茅台酒因已获得全国名酒称号,不参加本轮全省评比。参评的白酒中,方酒获得第一名,董酒紧随其后,这一评选结果也成为贵州省推荐地方酒参加全国评酒会的重要依据。于是,在轻工业部筹备 1963 年全国评酒会并要求各省开展评酒活动后,1963 年 6 月,贵州省轻工业厅又一次举办评酒会议,最终决定选送茅台酒、方酒、董酒、平坝窖酒、匀酒、黔西白酒和花溪刺梨酒到中央参加评酒会。^⑦

而就在样品报送过程中,贵州省轻工业厅发现了方酒存在的问题。1963 年 7 月初,轻工业厅与省糖业烟酒公司共同到大方县联合厂进行调查,发现酒厂报送的样品与其在市场上销售的酒质量有差别。这个在一年之内迅速崛起的“名酒”,实际生产情况却并不理想:由于缺少原料,方酒在 1960 年刚起步就缩小了生产规模,到 1962 年年产量仅有 36 吨,真正参与生产的工人只有 3 人,其中还有 1 人轮歇。同时,酿酒的原料无法保障,“来什么粮就用什么粮”,经常以谷子代替高粱酿酒,操作方

① 1954 年,大方县政府将原有的造纸厂、钾销厂、纺织厂、土酒厂合并为大方县联合厂。

② 贵州省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方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1、323 页。

③ 《贵州省轻工业厅、商业厅关于印发全省评酒会议结果的函》(1962 年 1 月 22 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 77-1-761。

④ 《贵州省轻工业厅转发毕节专署工业局关于饮料酒质量鉴定评比会议报告参考函》(1962 年 2 月 14 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 77-1-761。

⑤ 《贵州省轻工业厅关于成立全省评酒委员会的通知》(1962 年 6 月 30 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 77-1-761。

⑥ 《贵州省轻工业厅转发全省评酒会议情况的函》(1962 年 12 月 10 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 77-1-761。

⑦ 《贵州省轻工业厅请报送酒样参加全国评比由》(1963 年 7 月 4 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 77-1-1060。

法也是更为低廉的小曲法,而非名酒要求的大曲法,不合格酒占库存90%以上,且味道发苦,远远不能达到标准。大方县联合厂用厂内仅存的一点合格样品送去评选,但实际库存和销售的却是质量低劣的产品。最终,贵州省轻工业厅决定,方酒不送中央参加评比。^①

1963年11月2日,全国评酒会在北京开幕,会选出18款全国名酒,其中白酒占8款。在贵州省报送的产品中,茅台酒和董酒一举夺得“全国名酒”称号。^②除评选名酒外,本次评酒会还制定了《全国评酒办法》和《全国名酒优质酒质量管理办法》,对酒类如何选送评比、评比后的名酒如何监督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轻工业部会定期组织品评检查质量,名酒每年2次,优质酒每年1次,每次检查前,各酒厂要寄送6瓶样品到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同时样品必须是出厂销售的成品。此外,名酒和优质酒都要制定产品标准,标准在轻工业部备案后不得更改,如果不能按标准生产则必须改换商标。^③上述办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1956年前后“八大名酒”质量普遍下降的事件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地方在选送优质酒参评时出现类似方酒的问题。轻工业部想尽各种办法严控评酒的高标准,以实现评酒会对全国酒类质量的正向激励。

全国评酒会结束后,轻工业部很快开始检查酒样与真实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差距,首次入选全国名酒的董酒尤其受到关注。在评酒会中,董酒的样品是按照工艺标准和储存时间出厂的,但经调查,其1963年1月至11月共产酒68吨,已销售54吨,库存的14吨酒中仅有4吨符合样品质量标准。换言之,刚刚摘得“全国名酒”称号的董酒,在质量方面亦不能达到轻工业部的“名酒”要求。事后,贵州省轻工业厅迅速做出解释,称酒厂正在大力整顿,“准备做一个重点来抓”,希望轻工业部能够保留其名酒称号。^④1964年5月,贵州省轻工业厅决定将省内的名酒和优质酒都收归省管理,地区工业部门不得再介入,其生产由省轻工业厅管理,酿酒原料由省粮食厅下达指标,调拨由省糖业烟酒公司负责。^⑤

1963年前后董酒和方酒的创牌,乃是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全国评酒机制在地方的实践。通过1952年评酒会和1955年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对名酒质量的强调,全国的大小国营酒厂及各地轻工业部门都意识到,“全国名酒”并非仅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入选产品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流通市场,以及更多的投资额度和生产资源。在资源捉襟见肘的贵州省,茅台酒带来的示范意义更使省内地方酒厂的竞争激烈化,以至于出现省内评分第一的方酒通过调换样品、隐瞒生产规模取胜,最终被取消参加全国评酒会的资格。就算是入选全国名酒的董酒,其产品质量也不够稳定,与名酒标准存在差距。但整体而言,“全国名酒”的符号价值通过评酒会的选拔机制成功确立,同时与酿酒行业资源的分配联结起来,成为计划经济时期名酒规划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计划体制下的名酒“试点”与技术推广

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名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后,努力使其增产便成为下一阶段的目标。1963年评酒会使白酒品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全国名酒中白酒的名额由4种增至8种,另有优质酒若干。评酒结果也对传统名酒厂造成了一定冲击。此次入选的八大名白酒内部,亦有排序,依次为五粮液、古井贡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茅台酒、西凤酒、汾酒、董酒,茅台酒仅列第五位,西凤酒和汾酒列第六、七位。从排名来看,新入选的五粮液、古井贡酒、全兴大曲名列前茅。据1963年主持全国评酒会

① 《贵州省轻工业厅转发我厅食品处和糖业烟酒公司对方酒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1963年7月27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② 《全国第一至四届评酒会名酒优质酒名单》,《酿酒科技》1985年第1期。

③ 《全国名酒优质酒质量管理办法(草案)》(1963年11月),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④ 《贵州省轻工业厅关于董酒有关问题的报告》(1963年12月17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⑤ 《贵州省轻工业厅、商业厅关于省内地方名酒及优质窖酒由省管理的联合通知》(1964年5月7日),贵阳市档案馆藏,档号157-5-291。

白酒组专家周恒刚回忆,此次评比白酒没有分香型评,导致不同香型的评比结果差别明显,在混合编组的规则下,评酒委员按照色、香、味的顺序依次品评打分,浓香型白酒的香气更浓烈,从而更占优势,造成茅台酒、西凤酒、汾酒等传统名酒排名落后。^①

评酒结果传回茅台镇,茅台酒厂称这是狠狠地“敲了一下警钟”。虽然评酒会的排名存在客观因素,但过去三年,茅台酒厂因响应“大跃进”号召,产能急速增长,生产质量大幅下降也是事实。贵州省轻工业厅也对茅台酒的质量提出意见,包括酒瓶渗漏、味道苦涩等质量缺陷。^② 同样,全国名酒之一的汾酒厂也因为“名列倒数第二”而十分紧张,先在厂内检查问题,并设立生产技术科和中心实验室,制定出检验标准,希望使生产流程各环节有章可循。^③

传统名白酒排名纷纷下降,也引起轻工业部的关切。1964年春节后,轻工业部和山西省轻工业厅联合组织了“总结提高汾酒生产经验试验工作组”,赴汾酒厂开展技术试点工作(以下称“汾酒试点”)。工作组由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所长秦含章带队,包括56名轻工系统干部、各酒厂工程师、汾酒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对汾酒的制曲、酿酒工艺流程进行系统调查,历时一年零三个月。^④ 同年10月,轻工业部和贵州省又成立试点组,抽调了辽宁、黑龙江、河北、天津、河南以及贵州省轻工研究所、贵州茅台酒厂科研人员,由主持1963年全国评酒会的酿酒专家周恒刚带队,秦含章也从汾酒厂赶赴茅台酒厂参与工作。工作组按照茅台酒的生产周期,从1964年到1966年分两期开展了技术试点工作(以下称“茅台试点”),并成立了茅台试点办公室。

技术试点是轻工业部实行的常态化制度,其目的是总结提取酿酒技术的一般性规律,并对其推广。在此之前,轻工业部就曾多次对名酒厂的传统技术工艺进行整理、总结,记录和保存其酿酒技艺的独特性。早在1955年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后,政府就希望通过整理和总结传统工艺解决名酒质量下降问题。1956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了12年长远科技发展规划,茅台酒等名酒被纳入“总结提高我国民族传统特产食品”的课题项目中。^⑤ 其他名酒厂也纷纷开展查定总结工作。1957年,食品工业部组织四川省工业厅、服务厅、糖酒研究室,以及泸州市服务局和泸州曲酒厂等单位组成“泸州老窖大曲酒总结委员会”,针对300余年来的传统操作法进行了系统整理,并编写《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书,公开出版。^⑥ 1959年4月至1960年3月,轻工业部的酿酒专家熊子书带领技术团队,主持了贵州茅台酒酿造技术的整理总结(以下或称“熊子书主持的总结”)。此次总结,由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领衔,参与的单位还包括贵州省轻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化工研究所以及茅台酒厂,总结工作还得到了苏联化工专家的协助,被列入“中苏合作”重大科研项目。^⑦ 在熊子书到来之前,茅台酒厂已经意识到恢复传统工艺的重要性,酒质也有所改善,此次总结就是要通过观察茅台酒完整的生产周期,发掘其生产工艺中的酿造特点。^⑧ 最终,团队提取出制曲、酿酒、成品勾兑等工序,编写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资料,使茅台酒的生产从感性经验走向公式化、指标化。^⑨

1964年开始的“汾酒试点”和“茅台试点”不仅要提升两家酒厂自身的产品质量,总结其工艺特点,更要总结出名酒酿造的一般规律,用于推广和扩大名酒生产。如图1所示,相较于1959年的工艺

① 周恒刚:《中国历届评酒回顾兼谈其作用》,马连镇主编:《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第1卷,第934页。

② 《贵州省轻工业厅关于我省饮料酒质量管理工作的情况》(1963年10月23日),贵州省档案馆藏,档号77-1-1060。

③ 《杏花村汾酒竹叶青酒续保名牌》,《山西日报》1963年12月14日,第2版。

④ 秦含章:《大搞现场科学实验,促进汾酒生产高潮》(1965年6月4日),《汾酒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汾酒通志》,第1203—1204页。

⑤ 熊子书:《贵州茅台酒调查研究的回眸》,《酿酒科技》2000年第4期。

⑥ 李大和:《泸州老窖,国之瑰宝——泸州老窖大曲酒五十年代查定纪实》,《酿酒科技》2004年第3期。

⑦ 熊子书:《贵州茅台酒调查研究的回眸》,《酿酒科技》2000年第4期。

⑧ 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贵州茅台酒整理总结报告(初稿)》(1960年3月),现存中国酒文化城博物馆。

⑨ 李大和:《中国白酒“三大试点”研究回顾》,《酿酒科技》2017年第6期。

总结,1964年茅台试点办公室的技术力量配备相对更齐全,分工也更加明确。科研组下设的5个小组人员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对茅台酒质量进行评估,总结其规律,并形成可操作的文字材料。^①此外,“茅台试点”与“熊子书主持的总结”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技术培训机制。参加茅台酒厂两期试点的骨干,除轻工业部、贵州省轻工业厅、中国科学院化工研究所的专家及本厂技术人员外,还包括董酒厂和来自全国各地酒厂技术骨干和轻工业系统干部,共43人。^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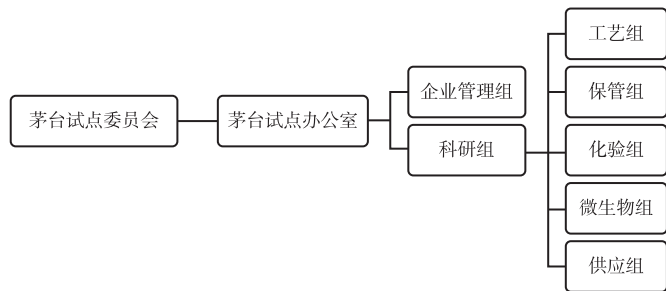


图1 茅台试点委员会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贵州茅台酒厂试点初步规划(草案)》(1964年7月16日),仁怀市档案馆藏,档号51—2—213。

把全国酒厂的技术人员聚集到茅台镇并非易事,如来自辽宁锦州酒厂的李宗民和刘丽华从锦州出发,须先坐3天火车到北京,再转2天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转3天火车到贵阳,之后转汽车到遵义,住1天后再转汽车才能到达茅台。两人在参加完试点回锦州时,又赶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参加茅台汾酒两酒厂的总结大会,从茅台镇回锦州一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③就在全国大小酒厂因“茅台试点”再次交流汇聚的同时,茅台酒厂内部的技术力量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964年9月,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的季克良与妻子徐英被分配至茅台酒厂。^④季、徐二人都是江苏人,也是酒厂首批具有专业背景的高学历人才,进厂后不久就被选入茅台试点工作组。试点期间,技术人员需要边观察记录茅台酒生产流程,边接受专业知识的培训,主要负责培训的正是主持过评酒会的酿酒专家周恒刚。^⑤最终,试点工作组对茅台酒生产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再次肯定了传统工艺的必要性,并通过化学检测澄清了传统工艺的若干争论,最重要的是对茅台及其他名酒的独特香味物质做了系统检测。上述重要成果修正了1963年评酒会不分香型的评酒做法,并为日后其他白酒的品评提供了标准参数。^⑥

“茅台试点”仅仅是轻工业部总结和推广名酒生产技术的环节。本轮技术试点,几乎所有名酒厂都参与其中,影响较大的还包括1965年启动的“泸州老窖试点”。工作组发现,以泸州老窖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在发酵环境上可复制,生产周期较短,己酸乙酯的香气成分容易控制,甚至“老窖”也可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泸州酒厂把“人工培养老窖窖泥”“加速新窖老熟的技艺”“成品酒勾兑调味技术理论”作为技术推广的核心要点,带动了全国浓香型白酒的大发展。在此期间,酒厂科技人员先后在成都、泸州等地举办了27期酿酒工艺和成品酒的勾兑训练班,为20多个省市培养了近千名酿酒技术人员。^⑦

① 《贵州茅台酒厂试点初步规划(草案)》(1964年7月16日),仁怀市档案馆藏,档号51—2—213。

②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编:《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第263页。

③ 《贵州省轻工业厅旅差费报表(李宗民、刘丽华)》(1965年12月13日),郭子健收藏。

④ 季克良等:《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7页。

⑤ 周心明:《走进“茅台试点”》,《中国酒》2005年第3期。

⑥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编:《50年白酒发展纪实:中国白酒业试点、科研、评酒汇编》,第59—61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9年印行,第21—23页。

“茅台试点”后,轻工业部不仅希望将茅台酒的酿造技术流程化,甚至还希望大规模复制茅台酒生产。离开茅台镇生产茅台酒的计划,早在“大跃进”时期就曾被提上日程。1958年11月,茅台酒厂提出在仁怀县棉农村、杨堡坝及赤水河对岸进行酿造茅台酒的勘察和实验,不过未能成功。^① 1974年4月,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明前往遵义,指示启动易地茅台试验项目,并派贵州省轻工业厅和遵义地革委、市革委及多部门在遵义选址、调查。7月,遵义市革委决定在市北郊董公寺试制“新茅台酒”。董公寺距离遵义市中心10公里,交通便利,有川黔铁路、川黔公路经过,同时地势与茅台镇相似,同样靠近水源上游,还是董酒厂的所在地。遵义市革委认为,此处“没有其他地上或地下污染,地下水丰富,水质良好”,气温适宜,是理想的新茅台酒厂厂址。此外,新厂址还毗邻董酒厂,董酒能在此地恢复成功并入选全国名酒,无疑使遵义市革委信心倍增。^② 根据遵义上报的试验方案,1974年8月,“茅台酒易地生产中间试制”获批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75年科技试验项目,并由贵州省科技局、轻工业局报请列入1975年国家科技计划。^③

新酒厂取名为“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以下简称“易地试验厂”),厂领导和技术骨干皆从茅台酒厂抽调,茅台酒厂原厂长郑光先、工程师杨仁勉被调至易地试验厂担任领导,二人都曾参与过“茅台试点”工作,此外又有40名技术员、酒师和工人从茅台酒厂调出。整个实验完全采用茅台酒的原料、酒曲、窖泥,流程也完全依照茅台生产工艺,被暂时取名为“茅艺回沙酒”,并注册“茅艺”商标,意为“茅台酒工艺”。^④ 易地试验厂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生产计划,预计当年即建成6个容量万斤以上的酒窖,计划1977年就能达到茅台酒标准。^⑤ 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亲赴易地试验厂,并且说到:“茅台酒发展大有希望,试验要继续下去。”很快,茅台酒易地试验就被纳入国家“六五”重点项目,试验由方毅亲自牵头负责。1985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轻工业厅对易地试验厂试制的茅台酒进行成果鉴定,评酒委员认为试制酒已接近茅台酒水平,基本具有茅台酒风格。不过,“茅艺回沙酒”仍然无法与茅台酒一模一样,主要在于无法复制茅台镇形成微生物群的环境,易地复制茅台酒的规划未及预期。最终,“茅艺回沙酒”改名“珍酒”,开始作为地方名酒在市场销售。^⑥

名酒试点作为一种计划经济时期独特的技术流通制度,反映出政府名酒规划的路径选择,“茅艺回沙酒”更是国家通过行政力量复制名酒的一种尝试,上述政策也为市场化前后地方白酒工业转型留下诸多遗产。

四、市场化前后名酒工艺及品牌的传播

1979年,轻工业部组织的第三届全国评酒会在大连市召开。根据1963年全国评酒会制定的办法,第三届评酒会原本应在1968年举行,但因“文革”被迫中断,直到1979年才恢复五年一度的全国评酒周期。此次评酒会,各省市共有104种白酒参评,占酒类总数的1/3。周恒刚再次主持了本届评酒会白酒组的品评,据其回忆,此次评酒采取了新的编组方式,主要根据香味的“典型性”编组,包括酱香、浓香、清香、米香和其他香型等。在本届评酒会之前,吸取茅台、泸州老窖工艺和香气的湖南“白沙液”就曾受到关注,尽管评酒委员们对这种兼具多种名酒香型的新事物尚未达成共识,但追求

①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编:《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第372页。

② 《遵义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试制茅台酒的报告》(1974年7月22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33-1-435。

③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科技局、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轻工业局请示批准贵州茅台酒易地生产中间试验计划任务书的函》(1974年8月28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46-22-12。

④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茅台酒百年图志(1915—201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⑤ 《遵义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试制茅台酒的报告》(1974年7月22日),遵义市档案馆藏,档号33-1-435。

⑥ 袁泽光:《茅台酒厂四十年巨变》,贵州省仁怀市政协仁怀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仁怀县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印行,第24页。

名酒的香气已成为各酒厂的共同目标。^①

在香型因素的作用下,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白酒很难出头,而模仿吸收名酒香型的新产品则更容易名列前茅,即使是对于评酒会分组中的“其他香型”。“白云边”是湖北省松滋县酒厂在1973年新试制成功的一款大曲酒。松滋县酒厂始建于1952年,由县政府接收民国时期的私人作坊组成,原本只生产低廉的小曲酒。1970年开始,松滋县酒厂开始试制大曲酒,并于1972年成功试制“松江大曲”。在此基础上,该酒厂又吸取了名酒厂的技术,综合了茅台的酱香和泸州老窖的浓香,于1975年将“松江大曲”改为“白云边”酒。1979年,“白云边”在全国评酒会上入选其他香型分组中的全国优质酒。^②此后,这种结合了茅台、泸州老窖等名酒香型和工艺的新酒类,又被明确为“兼香型”,这也反映出计划经济时期名酒技术的推广乃至创新。^③

此次入选的全国优质酒中,还有一些特定地区的新产品集中入选,河北省即是其中的代表。入选优质酒的河北省白酒包括邯郸酒厂的丛台酒、廊坊酒厂的迎春酒和三河燕郊酒厂的燕潮酩。邯郸酒厂成立于1948年,最早仿照汾酒和西凤酒的工艺生产清香型大曲酒。自“泸州老窖试点”后,邯郸酒厂开始“转型建窖”,并派人赴泸州酒厂学习,混合制成“人工老窖”,^④1965年曾作为正面典型参加了全国名酒会议。1972年,酒厂在原有“邯郸大曲”的基础上试制成丛台酒,并被评为河北省名酒,进而入选全国评酒会。试制丛台酒亦是官方对人工老窖技术推广成功的宣示。^⑤迎春酒的香型为酱香,工艺采用廉价的麸曲,是周恒刚主持完“茅台试点”后对低成本酱香工艺复制的一次尝试,周恒刚1973年春到酒厂指导生产,1974年即试制成功。^⑥因此,正如文章开头所述,“茅台酒工艺”就成为迎春酒自我推介的特色之一,其也乐于被称为“北方小茅台”。燕潮酩则源于1974年周恒刚前往燕郊酒厂指导试制的麸曲浓香白酒,也采用了人工老窖技术,1976年试制成功并投产。^⑦三家酒厂都是地方创牌潮中的佼佼者,不仅得益于名酒试点的技术流动,也在于培育新名酒的技术专家正是评酒会的主持者。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各地都对复制名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地区干部甚至把新酒能否成为名酒视为“上去上不去的重要关键”。^⑧

另一组肩负使命的新产品也是“复制名酒”的成果,而它的背景是要解决首都人民只有二锅头酒喝的窘境。1974年,为响应北京市委提出的“北京市是首都,白酒不能只有二锅头酒”的号召,北京市酿酒厂的技术专家王秋芳邀请周恒刚在昌平区酒厂展开试点。此时,廊坊的迎春酒已试制成功,王秋芳对昌平也充满信心。^⑨仅3个月的时间,新酒便试制成功,昌平酒厂将其取名为“燕岭春”。两年后,另一款具有茅台酒风格的“华都酒”也在昌平酒厂试制成功。^⑩同时期,王秋芳又在大兴县酒厂主持试点,酒厂模仿五粮液工艺,于1977年试制出“醉流霞”。牛栏山酒厂则模仿泸州老窖工艺,于1973年试制出“北京大曲”。^⑪不到五年时间,北京市通过复制名酒技术,已经创制了若干本地名酒。

① 周恒刚:《全国评酒会议白酒组见闻》,《酿酒》1980年第1期。

② 湖北省松滋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松滋县志》,1986年印行,第386页。

③ 沈怡方主编:《白酒生产技术全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369页。

④ 所谓“人工老窖”,即以人工方式培养微生物群,在较短时间内模拟天然老窖池的微生物环境。

⑤ 张书田:《丛台酒科技进步及历史研究的回眸》,《酿酒科技》2001年第3期。

⑥ 刘军:《北方小茅台》,《中国食品》1990年第3期。

⑦ 李春华:《三河燕潮酩酒业有限公司的由来与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河市委员会宣传文史科编印:《三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2000年印行,第144页。

⑧ 《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为明年制酿更好的酒、满足人民需要的酒》(1978年11月),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107-01-0006-41。

⑨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编著:《王秋芳传》,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2页。

⑩ 郑怀义主编:《京郊企业发展启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⑪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编著:《王秋芳传》,第82页。

茅台等酿造工艺在全国多地的推广,使1979年评酒会的名酒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当然,试制新产品需要资金,20世纪70年代地方酒厂密集试制新酒和地方工业部门的投资密切相关。但若追究其原因,却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财政体制变动谈起。1970年3月,根据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国务院对各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实行下放。下放后,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从占全国总产值的42%骤降到8%。1971年3月1日,财政部规定实行地方“包干”,自1971年起,国家对省、市、自治区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大包干”办法,将除用于中央直属的基建和物资以及国防、外援等项目外的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地方。中央对各省实行包干,省又对地区和市、县实行包干。财政下放后,中央直接掌握的财力大幅下降,超收的全部归地方支配,短收的则要中央补贴。尽管这一政策在此后几年历经修订,但“包干”的精神并未改变。^① 学界对于这次下放的评价普遍不高,认为下放使各地方经济自成体系,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② 但从客观层面来说,下放的确提高了地方投资的积极性。由于地方的财政支配权增大,地方工业部门对生产型企业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增加。作为投资规模小、收益较快的轻工企业,地方酒厂在这一轮的体制下放中也获得了较多的资金支持。

1979年的评酒会正处于中国向市场化转型的过渡期,名酒规划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的评酒活动上,名酒光环也开始改变酿酒业的生态。尽管贵州多数酒厂缺席了此次评酒会,未能上榜,但20世纪80年代初仁怀县却迅速崛起了一批模仿茅台酒的非国营酒厂。曾经作为茅台酒扩产试验规划地的仁怀县棉农村,1979年划出部分农田给茅台酒厂。在支农政策下,棉农村获得了茅台酒厂100吨本用于饲料的酒糟。村支部决定,以100吨茅台酒糟开办集体酒厂,吸收村民入伙生产。1980年,棉农酒厂试制窖酒成功,并获得仁怀县评酒会第一名(茅台酒不在参评之列)。于是,棉农酒厂开始增资扩产,由于带着茅台酒糟的光环,其生产的白酒十分受市场欢迎。1983年,棉农酒厂注册“茅河窖”商标,并挂名“赤水酒厂”,成为正式企业。次年,茅河窖就被评为“遵义名酒”,当地人称之为“二茅台”。“二茅台”的畅销一方面与乡镇企业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亦是仁怀县加速发展白酒业的结果。像赤水酒厂这样有着“二茅台”光环的企业,正是利用“茅台”的名酒声誉做宣传打入市场。^③ 1984年,仁怀县委县政府做出“大力发展酒业生产,振兴仁怀经济”的决议,并专门成立办公室管理酿酒业,“一时城乡掀起办酒厂的热潮”。当年,仁怀县境内就涌现出数家酒厂和带有“茅”或“台”名号的白酒产品,包括“茅河窖”“茅渡窖酒”“怀台酒”“台良窖酒”“台源窖酒”“台乡窖酒”“茅春窖酒”“台河大曲”等。^④

仁怀县的“放开搞活”也造成茅台酒被仿冒的危机。自酿酒业放开之后,仁怀县将原本属于工商管理局管理范围的酒厂发照审批权划给县中级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对商标也不要求注册。办公室在县委发展酿酒业的政策指示下鼓励成立酒厂、放松审批。同时,由于“茅台”的符号并非仅仅代表茅台酒厂,还兼具“茅台镇”行政区划的涵意,因此凡是在茅台镇的酒厂都认为厂名或商标带有“茅台”字样乃合情合理。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仿冒情况更多了,县内87家酒厂134种商标,有一半以上“侵犯茅台酒商标专用权”,商标带“茅”字的有34种,带“茅台”字样的有51种,在显著位置标有“茅台特产”“仁怀茅台”字样以及风格与茅台酒商标相近的有49种。^⑤ 1984年5月2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108页。

② 参见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少年壮志“二茅台”记贵州省仁怀县赤水酒厂》,贵州省写作学会编:《企业春秋(2)》,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④ 贵州省仁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404、407页。

⑤ 《仁怀县仿冒茅台酒商标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1986年5月7日),郭子健收藏。

日,贵州省经济委员会和工商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维护茅台酒信誉”,特别强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许使用与茅台酒相似的商标和包装。^①

1979年的评酒会恰好在市场化初期举办,而事实上的评酒结果也反映着计划经济时期名酒规划及名酒技术推广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各地酒厂面临改制和市场竞争的挑战,评酒会也由行政资源演化为市场资源,“全国名酒”和“全国优质酒”的称号被酒厂作为市场营销的资本,甚至有的地方酒厂不惜以行贿评酒委员或主要负责人的方式争夺这一称号。1988年1月,贵州省道真县银山乡酒厂作为县办集体企业准备参加当年农业部举办的评酒会。该厂生产的“银山乡窖酒”原本不符合参评条件,其时任厂长多次向主管此次评酒会的某处长行贿,大送名酒现金,换回了参评资格和“农业部优质酒”的称号。仅此次评酒活动,负责主管评比的处长就收受了28瓶茅台酒,道真县银山乡酒厂在北京“运作”期间,购买用来送礼的茅台酒就多达1330瓶。^②酒厂还花巨资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借机宣传银山乡窖酒,并送给北京某报社办公室主任6瓶茅台酒。时任厂长刚上任时,银山乡酒厂处于生产停滞状态,银山乡窖酒因质量不佳而推销困难,酒厂面临生存危机。酒厂因此向银行贷款4万余元,几乎全部用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和行贿官员。在时任厂长看来,获得“部优”称号就是将酒厂带出困境的唯一出路。^③同时期,评酒活动越办越多,各地酒厂为通过名酒称号打开市场,“钱、牌交易”甚至成为常态。时有名酒厂联合发出“抵制滥评酒”的倡议。^④1989年举办的第五次全国评酒会,更是出现数十家酒厂联名举报营私舞弊的情况。^⑤最终,国家经济委员会在1991年决定终止全国性评酒活动。

五、结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的白酒企业纷纷以“名酒”为营销口号参与市场竞争,但名酒的规划、培育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49年后,新政府逐步将原有白酒作坊国有化,通过官方评酒会议确定了一批“全国名酒”。同时,白酒生产被纳入工业化轨道,获得“轻工业品”的新定位。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什么要积极发展轻工业消费品?虽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政府往往压缩民众消费的比重,以实现更高的积累。但另一方面,消费却又与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更反映着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实力,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葛凯(Karl Gerth)在讨论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大件”时,强调了轻工业品的制造能力与新政权的国际形象密切相关。^⑥马克·兰德斯曼(Mark Landsman)关于东德消费史的研究也揭示出,作为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模式经济体,东德仍要面对西德物质消费充裕的挑战,满足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在意识形态竞争的条件下也具有高度的政治迫切性。^⑦1955年底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对名酒质量的关切自然也有上述因素的考虑,当增产节约运动对名酒质量造成负面影响,茅台酒厂极力避免给外界造成“社会主义建成了,名酒质量下降了”的印象,也反应了消费品质量和品牌声誉背后的政治意涵。但进一步而言,作为专卖制度下的消费品,酒的财政贸易意义同样十分重要。轻工业部门规划名酒,一方面可以提高酒的产销量,释放消费需求,吸纳居民购买力,充实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是满足对外贸易需求,实现出口创汇,因为“在

① 《贵州省经济委员会、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维护贵州茅台酒信誉的几项规定的通知》(1984年5月2日),贵阳市档案馆藏,档号77-9-614。

② 《评酒会上利用职权舞弊受贿,农业部副处长张滨被逮捕》,《人民日报》1989年8月25日,第1版。

③ 施中传等编著:《中外廉政与腐败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176页。

④ 《17家名酒厂呼吁:制止滥评酒》,《人民日报》1994年8月9日,第2版。

⑤ 《酿酒业繁荣的背后》,《人民日报》1989年8月25日,第5版。

⑥ Karl Gerth,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8-40.

⑦ Mark Landsman, *Dictatorship and Dem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erism in East German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10-211.

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要在竞争中取胜”。^①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重视名酒规划,有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意涵。

名酒规划在计划经济时代实现的路径也具有独特性,行政力量成为其主要推动力。政府通过评酒制度逐步建立起名酒产品体系,由于名酒称号决定了国营酒厂及所在地方工业部门获得资源的多寡,各酒厂在参与评酒机制时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向。轻工业部通过技术试点和技术移植推广名酒酿造技术,国家主导的技术协作,也使不同产地、区域酒厂的规模化复制成为可能。总体而言,通过行政力量实现的名酒规划塑造了当代中国白酒工业的格局。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人们津津乐道的“八大名酒”仍然位于白酒行业的前列,有些已转型为新的龙头企业。

最后,名酒规划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深远影响,计划经济时期的名酒规划,成为改革开放后酒厂改制、创牌甚至从事商业营销的制度源流。标榜茅台工艺的宣传营销、评酒会的暗箱操作以及仁怀县的仿冒热潮,皆显现出市场化初期“名酒”称号的商业价值。这让我们在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不仅要对中国“市场”做出重新评估,也要考虑到看似“僵化”的“计划”体制背后,也许包含着诸多政策实用主义要素。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the Well-Known Liquor Program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Guo Zijian

Abstrac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inese Baijiu industr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ok part of market competition as the “well-known liquor” because of the well-known liquor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However, the well-known liquor program was born of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In 1953, the eight well-known Chinese liquor brands, were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tabilize the market and inherit the well-known produc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he production of liquor had been opted in the light industry. The well-known liquor gradually became significant to the government revenu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PRC regime. In the 1960s, the open liquor rating system nationwide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Light Industry. Then other Baijiu manufacturers, one after another, followed suit and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he well-known liquor rating, to get more investments. And meanwhile, the “Maotai Pilot” program and the “Nonlocal Maotai Pilot” program were successively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Light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means were utilized to promote the famous liquor brewing techniques nationwide to increase output of the famous liquors. With joint influence from the aforesaid factors, local Baijiu manufacturers, one after another, tried their utmost to create their own brands since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were transferred to lower levels in the 1970s. On the one hand, they succeeded to rank among the well-known liquor brands relying on techniques generalized across the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ttempted to expand their brand influence by following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Maotai. The well-known liquor created by the state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s have served as important sources for liquor manufacturer restructuring, brand creating and business marketing after the reforms and opening-up.

Keywords: Well-Known Liquor, Planned Economy, Industry

(责任编辑:马烈)

^① 《做好外贸工作》(1961年5月13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